

穿越间距的历史书写与讲述

□赵奉蓉

《王立群读宋史之〈宋太祖〉》(以下简称《宋太祖》)在央视“百家讲坛”播出的同时,图书由大象出版社首印23万册发行。从听众、读者的热议乃至签售实情来看,他们对此书的青睐并非盲目跟风。这一个例折射出大众对历史的普遍需求并没有消减,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尊重历史真实基础之上的大众史学应该如何书写与讲述,这是史学大众化的一个严肃课题。

严谨的学术性为根基

在王立群教授看来,当下的历史读物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专业性的,即史学专著。它通过大段的引文、详细的注释、烦琐的考证以及需要经过严格训练才能掌握的话语资源来呈现,理所当然地被限定在专业研究者以及意欲成为专业研究者的相对狭窄的圈子中传播;第二类是普及性的,它需要并且依靠历史文献的资源但拒绝大段的引文与烦琐的注释,通过排比历史事件的诸种争议、强调历史事件的细节与分析并以通俗易懂且不排斥流行语词的语言方式来呈现,顺理成章地成为大众史学的主要形式;第三类是娱乐性的,它喜欢野史艳史,关注奇闻逸事,甘心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追求“娱乐至死”。王立群教授将《宋太祖》定位为“比较靠谱的大众历史读物”。

历史研究在不同层面上至少表现为三个不同的目的:追求事件的真相、明智明理、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无论何种目的,其根基必须建立在严谨的学术性上。只有具备了专业性的根基,才有可能撰写出真正普及性的大众历史读物,这样历史就叫“靠谱”。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去粗取精,辨伪存真,绝非易事。一则文献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会遮蔽了历史的真相,必须辨伪存真。二则宋代开始大量雕版印刷,传世文献汗牛充栋,去粗取精的工作亦颇为困难。史料分为一级文献、二级文献、三级文献。一般而言,一级文献是较为真实可靠的,二级文献运用时则要区别对待,要相对谨慎,三级文献则能不用就不用。王立群教授对史料的选择与使用相当严谨,也由此使其读史系列图书与追求“娱乐至死”的历史读物有了明确的分野。《宋太祖》一书,依据的主要典籍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其次是《宋史》,再次则为宋代的笔记,而《宋朝纪事本末》等据之再编的文献则一般不用。严格而言,《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均非第一手的资料,其主要来源则是宋代的《实录》与《国史》等,但在《实录》与《国史》已经佚亡的情况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已经具备了事实上一手资料的性质,而且这些属于正史,编撰相对严谨公允,理所当然地成了《宋太祖》的主要材料来源。王立群教授对宋代笔记的选择与使用上非常谨慎,在确定某种笔记本的性质基础之上,往往以笔记中的材料作为一说,只有与正史的记载能够相互印证时,才作为信史使用。

孤证不立。《宋太祖》一书,有依据的主要典籍,但在一些存有争议的问题上,会纲目清晰地列举不同典籍中的不同记载,进行排比分析,在矛盾与重合中逐步挖掘历史的真实。此种谨慎的历史书写不仅保证了史学读物的学术品质,也使此类读物具备了较强的可读性。

与其他读者一样,王立群教授亦是历史的读者,有一己之倾向。但是,他同时还是《宋太祖》一书的作者,在史学大众化的普及过程中,他更多的是历史阅读的引领者,需要的是客观公正,从原文老老实实的解读中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不是为了求新而求新,更不会搞“一言堂”,因为历史可以“为我所用”,但绝对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映照出已经逝去的岁月里人们的功过是非,不论其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都不可避免地留下他或她真实的身影。只不过有的画面宏大壮阔,有的像细小的尘粒;有的名垂千古,有的稍纵即逝。但是,其铭刻在历史上的痕迹是无论如何也抹不去的。而如何评价他们,摆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只能凭借后人的眼力了。

于大清的《在历史的夹缝中寻找》不是全景式的俯视历史全貌去评价人物,而是从“历史的夹缝中”去“寻找”最具典型的焦点,因此,较一般的读史者则显得视角甚为独特,思虑更加深刻而精邃。在我看来,却有一种剑走偏锋、慧眼独具的意味。

首先,我们察看大清是怎么评价几位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重量级的历史人物的。那就是秦皇汉武和魏武唐宗,这几个“大人物”都是创造甚至改写中国历史的伟大先驱。怎样观察他们在推动历史车轮进行中的成功与失误,以及他们在人格上独特的方面,一般的历史经纶中几乎都有过论述,人们的认识几乎是定型了。但是,于大清却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重新进行审视,就是借助于那一个特殊的道具——“东临”碣石。

秦始皇扫平六国,一统天下,定都咸阳。为了他的万世基业,同时寻找长生不老的药方,他不断出巡全国。当他在一次巡行到浩瀚无边的大海之滨时,意外地发现了这些碣石,于是,他的灵感来了,要在这里修建行宫,并刻石树碑,以显其“千古一帝”的赫赫武功。从此,这些碣石就大有名堂了。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他的皇位

不是“惟我所用”。“不讲一家之言”(王立群语)的态度与做法对大众史学尤为关键,它理应成为大众史学书写的一个根本原则。

严谨的学术态度、扎实的学术功底,让《宋太祖》一书扎根于坚实的学术土壤中,从而与“漫谈”类的漫无边际、“戏说”类的娱乐至上划清了界限,也由此使王立群教授的读史系列成为真正靠谱的史学读物。

深邃的史识为内里

历史的传播有不同的路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传播历史,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优秀的历史传播者。历史学家必备“才、学、识”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尤以“史识”最为重要。《宋太祖》一书在忠实原文讲述历史的前提下,通过对事件的条分缕析、探源追索,展现了深邃的历史观念。

第一,对比差异,条分缕析。

讲史有两个支点,一是讲述历史事件过程,介绍人物故事;一是以史为鉴,立足当代评点和解读历史。这两个支点看似简单,真正做好却非易事。首先,历史已然过去,我们看到的历史是记录下来的、经过选择的历史,从被记录下来那一刻起历史便已开始远离真实,勿论历史记录中刻意造假的存在。其次,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在接受历史之时,面对同样的材料,囿于不同的因素,结论自然有所不同,甚或迥然有别。在此种情况下,我们惟一能做的是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

面对远去的历史与层累的构造,该何去何从?从众说纷纭的记载中条分缕析,从错综复杂的叙事中抽丝剥茧,从而接近历史真实,这是王立群教授的一贯做法。

在解释的过程中,王立群教授扮演的是断狱老吏的角色,基础调查,广辟线索,锁定嫌疑对象,定罪结案,在文献记载的阙略或相互矛盾抵牾之处,见微知著,追索历史真相。以“斧声烛影”、“非常事件”为例,《宋太祖》将两个版本的详情呈现给读者,读者通过直观的文字差异可以形成自己的预判。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对此文字差异导致的赵匡胤之死的两种不同观点,即“正常死亡说”与“非常死亡说”的对比分析,分别从作案动机、作案时间、作案之后的异常表现等方面给出了有力的分析,最终将犯罪嫌疑人锁定为赵光义。王立群教授能够准确破案,这就是比较分析的力量。

第二,以小见大,以点带面。

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有时候细节对历史发展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细节不可忽视,历史著作除却大的背景之外,还应该从细节入手,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发掘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内容,普及性的历史读物更应如此。

从第一本百家讲坛系列图书《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起,先后有项羽、吕后、秦始皇、刘邦、赵匡胤等人物传记类的著作问世。看书名,似乎王立群教授讲的仅是帝王的生平事迹,实际上,这些系列图书是以人物为中心,奉献给我们的是秦朝的发达、发展、兴盛与灭亡的全过程,汉代的打江山、定江山的图景,大宋王朝的建国历程,通过实实在在的人物、事件,展现历史变迁。枯燥乏味的史料堆积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有血有肉、具体可感的人物,这就是“化腐朽为神奇”。

深邃透彻的历史评论与以点带面的探索方式,二者的关注对象有异,却殊途同归。二者又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从千丝万缕的历史细节发掘背后的盘根错节,讲解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传播历史经验,由此日益接近历史的真实。

剑走偏锋 慧眼独具

□程树棟

刚刚传到他的儿子胡亥,就被遍地起义的义军给推倒了,空留下那几块碣石,成为他“功高盖世”却又“罪行累累”的一个短命王朝的象征。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举世所公认。但是,他又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也为他的臣民带来无穷的后患。他也有出外巡查的癖好。就在多次出巡中,有一次走近了这几块碣石,从而又为这里涂上了亮丽的色彩。特别是他在秦始皇刻石碑的基础上,又建造了一座气势恢宏的观海台,站在台上,放眼望去,只见波涛万顷,海天相接,当时的这位“天子”是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但是,在这浩瀚的大海面前,在那几块小小的碣石边,他又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从而改弦易辙,踏出另一条暮年帝王的人生之路。

“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这是毛泽东赞美曹操的诗句。在历史上曹操绝不是小说和戏剧舞台上的反面人物,而是文武兼备、雄心勃勃、锐意进取的有识之士。他是在挟带着官渡之战大败袁绍的声威,远征幽燕辽海和乌桓的胜利,欲实现北都中国统一的豪情来到这碣石边的。在这里他触景生情,写下了壮丽的诗篇,为后人留下无尽遐思的空间。但是,磅礴的诗句毕竟不能代替宏伟的勋业,在未能进入

他预设的理想壮志之后,曹操导演的大幕便悄然地闭上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遗憾——

过了400余年之后,又一位“一代天骄”来到了碣石边。那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他的宏图大业,他的“贞观之治”,一直为华夏后人所称道,而世界许多国家的“唐人街”、“唐城”,依然传续着大唐的荣光。但是,当李世民的功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在远征途中“东临碣石”时,走了下坡路。因为他当时已经不是那个从谏如流的有道明君,而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皇帝。虽然他的那首《春日望海》显得志得意满,可是,此后不久,他便因迷恋食丹很快地走到了人生的终点,重复了他曾经嗤之以鼻的秦皇汉武的老路。

以上几个“伟人”的“东临碣石”的故事,在今天仍然有借鉴的意义。它至少让我们认识到除了辽阔的国土外,尚有博大的海域等待我们去开发。紧接着作者又启示我们在历史的夹缝中窥视三个绝对的女人,那就是吕后、武则天和慈禧太后。她们既是女中豪杰、女人典范;又是女中恶煞、女人异类。她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诸多帝王将相玩弄于股掌之中,将中国的历史搅得色彩纷繁甚至改变了前行的轨迹。但她们的人生,她们的

多样的趣味性为支撑

王立群教授讲史特别重视历史的趣味性,这是史学大众化的重要手段。趣味性是对现代史学研究过分强调规范的反动,是与历史普及极为契合的样式。《宋太祖》以不同的文学手法,实现了在趣味性中普及,在普及中提升兴趣的效果。

第一,引人入胜的标题。《宋太祖》每一讲皆有大标题、小标题,大标题概括主旨大意,40个大标题基本是四字为主,言简意赅,句式凝练,在有限的字眼里设置悬念。具体而言,一是题目内容本身的魅力。在宋太祖的一生中,有几件事情是绕不过去的,而且在历史的传承过程中被多次强化传播,成为与赵匡胤形影不离的话题,即“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烛影斧声”,这关涉赵匡胤的个人兴起、王朝稳固与命运归属的问题。一是题目设置的吸引力。《宋太祖》的大标题中,有的显示出悬疑性,有的比较新颖,有的则直击人的感情。小标题则综合运用各种方式,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形成了不同的标题类型。一种是让历史人物说话,如《百炼成“真”》一讲,分别用赵匡胤、赵光义、赵枢、赵普的独自结构全篇;一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如《关键先生》,“先试试刀”、“初征南唐”、“再征南唐”、“三征南唐”,说明赵匡胤的“关键”所在;一种是按逻辑层次逐步推进,如《太祖誓约》一讲,有转折,有递进,层层推进。

第二,流行新潮的用词。

王立群教授的讲史素以“沉稳”、“儒雅”为主,然而“严谨”、“厚重”并非与现代绝缘,更不是与新潮划清界限。这种讲史风格在《大风歌》中渐成气候,到《宋太祖》中渐入佳境。有直接引用网络用语者,有化用影视曲词、诗词、俗语者。这种风格的尝试与成熟,首先造就了一种既“陌生”又“亲切”的效果。在人们接受了王立群教授“儒雅”的主打风格之后,现代网络用语的恰当嫁接,让人们在惊呼之余油然生一种新奇感,使图书的阅读群向年轻一族张开双臂。其次还造就了“亲民”的路线,“亲民”自然是史学大众化、普及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第三,一波三折的叙事。

文章写作最忌平铺直叙,一览无余。经过精心的构思、层层的铺垫,适时地抖出“包袱”,对于提升著作的趣味性至关重要。《宋太祖》在谋篇布局上力避“平”,恰似其分地设置“波澜”,形成了一张一弛、跌宕生姿的效果。随着叙事人态度的变化,读者感受到了不同的情感体验,时而迷茫无措,时而恍然大悟,时而感觉不过如此,时而拍案叫绝,构建起历史与想象之间的张力,并对产生共鸣。历史写作文学化,可以促进史学的大众化,但必须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不能以牺牲真实来博取趣味。这是中国传统史学中所谓的“史笔”与“文笔”的调遣问题,在“史笔”与“文笔”的比例、层次等方面,《宋太祖》实现了很好的设定与均衡,为史学的大众化创造了一个典范。

王立群教授读史系列的成功给我们至少两点启示:历史是人的历史,完全可以以人为中心进行书写与讲述;历史的书写不能排斥而且需要文学化的书写。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穿越历史的间距,真正实现历史的大众接受。

沉稳严谨的探索、冷峻独到的思考、诙谐幽默的笔致、兼容蕴藉的胸怀、关注现实的自觉,无疑构成了王立群教授写史、讲史的基本特征。王立群教授的史学著作不仅是“靠谱的大众通俗读物”,能够满足大众了解历史真相的需求,而且还是“有趣的学术著作”、历史研究的入门读物。

事业,她们的情感,又是那样的矛盾与复杂,带给后人无尽的思索。

作者在这里并没有为我们详尽地述说这三个女人漫长的生命历程,但对她们的功过却进行了不同寻常的分析,没有一味地贬损她们,也没有片面地颂扬她们对特定的历史时期所作的贡献,而是辩证地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论证,使读者有某种豁然开朗、另辟蹊径的感觉。比如吕后,不仅写出她的阴狠毒辣,也写出她的聪慧敏锐;对武则天,不仅写出她的勃勃野心,也写出她的才能与功业;特别对慈禧来说,人们往往提到她,无不嗤之以鼻,认为这个女人通体坏透,对中国犯下了无可饶恕的滔天罪行。但作者却对其“网开一面”,从历史的夹缝中,使我们看到她执政于乱世,支撑着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晚年思谋变革,则呈现出另外的一副面孔。

历史就是这样吊诡,扑朔迷离,人们只能从纷繁的乱象中寻觅它的内涵和真谛。

此外,作者还为我们描述了众多的能臣和名将,以及历代的奸雄和大鳄。但都不是正面叙述,重复史书的定论,而是从某个独特的角度,选取极具个性的色彩,淋漓尽致地抒发异常的感受,读后让人耳目一新。

纵览全书,我们时时感到作者那如行云流水般的笔触,给读者以酣畅淋漓的快意,诸多精辟的论述,则发人深省;特别是那些带有哲理性的思考,出自作者独特的感触,不时闪出智者的火花,这就使本书不同于一般的史书或随笔,而是我们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难得的奇葩。

1993年6月,《上海文学》发表王晓明等学者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批评了几种流行的文化现象,如王朔的“痞子文学”等等。王晓明认为,当时中国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可以说是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作为这个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这包括人格的萎缩、批判精神的缺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僵化等等。文章发表后,《读书》杂志很快积极响应,推动讨论深入展开,发表了张汝伦、王晓明、陈思和、朱学勤等人的《人文精神寻思录》。紧接着,《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华读书报》等还开辟了专栏,由此,掀起了一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波及南北,影响深远。所涉及的问题,如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是何关系,市场经济导致人文精神的丧失还是促进人文精神的生长,当今中国需要提倡什么样的“人文精神”等等。通过这场讨论,不仅使人们对市场经济给精神生活产生的正负效应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而且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和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

20年过去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推进,尤其是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实际上并未中断,而且在各个领域不同程度和规模地一直在持续,只不过,这些讨论相对分散,没有形成必要的合力,没有在整个思想文化界掀起巨大的浪潮。因此,从有些方面来看,现实中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日益清晰,比如,如何理解人类的经济发展与整个世界存在的关系?如何理解人类在生物系统中的位置?中国人所需要、所追求的现代生活究竟是怎样的?更具体地说,什么样的城市生活才是好的生活?什么样的物质生活,才真正能促进人的物质享受能力?……在某个角度看,今天的文化研究所面对的,正是人文精神讨论当初模模糊糊感觉到的那个根本问题:新的中国,现代化的中国,究竟以怎样的文化和价值信念成为自己的精神依据?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精神文明不断提高的发展阶段。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也应看到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本身就是利弊共存的,一方面物质的极大丰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为人们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所伴生的科技文化的日新月异,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而另一方面,物质化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首先,物质的极大丰富与满足并不意味着人们幸福感的增加,因为不断产生的物质需求往往意味着旧的欲望尚未满足,新的欲望又会产生。例如消费主义的盛行,它导致人们深陷物欲的泥潭不能自拔,虽然人们能在疯狂购物中获得心理的暂时满足,但随之而来的新的消费需求又刺激着人们购买新的甚至无用的商品,这种周而复始的重复往往让“人”最终迷失在物欲的喧嚣中而很难独立。其次,媒介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泛媒介化正在对人形成围困之势,使人们日益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具体而言,进入新的世纪以来,现实中的每一个“人”,几乎无不被控制在三网融合的大“网”之中,或者被淹没在泡沫化、垃圾化的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人对机器的依赖,对高科技的依赖,甚至直接成为机器“控”,信息“奴”,其主体丧失及蒙昧无奈之状,比西方工业化之初更加严重百倍。而文化产业化的大势所趋,更是让文化前所未有的地成为了赚钱的工具。原本应该承担开启心智、开启民智大任的文化创造,却正在沦为商品化的奴婢。所谓“在商言商”,因而,对于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来说,其创作和生产的基本动机,就不可避免地往往把盈利放在第一位,或者作为基本出发点和考量标准。那么,文化的启蒙功能和责任,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因此,人文精神的建设问题,就不能不重新提起。

回顾以往,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最大的问题是,基本上被局限在现当代文学或文化研究的学科领域,即使其它学科也有相同主题的讨论,也往往是自说自话,互不沟通。如古典文学及文化研究、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国哲学研究等,都有过这方面的专题讨论,但是我们整个文化发展的方向性问题,是所有文化研究领域的具有核心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一定要把古今打通,把文哲史的各个学科领域打通,建立起通畅的文化对话。从而以更加开阔的历史、文化和哲学的眼光,寻求人文精神讨论与大文化研究的新的逻辑起点和思维脉络。在全球化、新世纪的今天,非常有必要再次开展一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更加深入有效地解决当下文化建设面临的严峻问题。

西湖

2013年第六期要目

新锐 李亚小说
孤独及其创造(创作谈)…李亚
世界上所有的青春…韩松落
枪枪三人行…张敦
语文课…曹多勇
韦白的诗…韦白
周文的诗…周文
烧制汉语(节选)…黑陶
自传与公传:1972(五)…董学仁
文学只吸引热爱它的人——“老书虫文学节”作家访谈…
余欣 张雨辰 胡少卿
逻辑、思想和“扳手”——王威廉
小说论…徐勇 徐刚
上下求索——徐则臣论…刘涛
张莉:反教条主义的批评家…周明全
人格魅力在生命抗争中闪光——评东苏的长篇小说《狼塔》…高松年

《扬子江》评论

2013年
第三期要目

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王德威
新世纪诗歌的突破及其限度…罗振亚
艰涩的意味——对一种诗歌倾向的判断…叶橹
复活母语、沟通中西诗学的写作…韩作荣
口述历史中的“白洋淀诗群”…王士强
范小青,如何PNY…魏鹤
《香火》:小说的“起死”…梁盼盼
《天旋律》…陈少松
从网络小说《西游无间道》谈起…方岩
曹禺《明朗的天》与1950年代初期